

新时代文学的超越 离不开时代精神的引领

□杜国景

我们知道,作家的成长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养,文学创作必须首先解决如何认识脚下的土地这类问题,地域因素与其特定的文化品质,一定会为文学打上与生俱来的烙印。然而,对有作为、有成就的作家来说,文学创作仅有地域特色肯定是不够的,真正的难题在于既立足于地域又超越地域。而超越的关键,首先在时代精神的引领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因价值观念与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局面,而有所谓“共名”时代与“无名”时代之说,但时代精神从来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一系列重大主题、建设目标、发展战略作出了高度概括,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新时代精神的新走向。在这样的时代,如果没有时代精神的引领,文学的超越将无从谈起,作家也不能通过自己的创作,与历史、与现实、与文学的未来对话,作家的前途、文学的前景,一定十分黯淡。

“五四”新文学发展到今年,正好是100年。在中国新文学的序列结构里,贵州比较边缘。回顾贵州作家成长的历史,无论是第一代的蹇先艾,第二代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那一批少数民族作家,还是第三代的何士光,都有非常突出的呼应时代精神的自觉意识,所以他们能在主流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反过来,如果只是一味地书写地域、乡土,甚至只是个人情感的自我欣赏和自恋自足,那就带来很大的局限,不少作家因此被遗忘了。

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贵州发生了极大变化,但到目前为止,很多地区仍属于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今天,十九大已吹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冲锋号,作为脱贫攻坚的主要战场之一,贵州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贵州代表团的讲话,对每一位贵州人都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不仅贵州作家,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应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都应当对十九大报告所凝聚的时代精神作出深刻理解,才能实现对接时代的超越,才能谱写出新时代文学新的篇章。

第四代贵州作家中,已经有不少人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最典型的是欧阳黔森的英雄叙事,他写长征、写抗战,写为改变贵州乡村经济作出贡献的“绣娘”,彰显的都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他的小说与影视作品有一个英雄形象的谱系。在当代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个人化叙事显出了几分贫血、孱弱时,欧阳黔森却在为它注入阳刚、雄浑、崇高,这就是英雄叙事的当代价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多民族书写,需要这样的当代价值。其他还有赵剑平的生态文学,冉正万的历史情怀,王华与肖勤迥异的女性视角与修辞方式,肖江虹、曹永的底层、地域与民族记忆,谢挺、戴冰和梦亦非的文本试验等。

2017年年初,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同时也为总结近两年贵州文学创作的成就,推动贵州文学创作走入新时代,省作协发起和组织了评论家、作家面对面交流、对话的大型系列活动,名为“贵州作家进行时”。在对贵州作家近几年作品的阅读中,我们发现了贵州作家的可喜变化,正是得益于时代精神的引领,比如肖

勤,她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的塑造,关注他们的情感,关注他们的成长,这几年的力度更是有史以来。《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写的便是最有“民生”内涵的医改、医保题材,这是在县乡农村最受关注也最敏感的领域。王华从2015年起,也开始写党的县乡基层干部典型,《海雀,海雀》写的是乡村好支书文朝荣,她最近和雷霖合作的《上路》,写的是贵州乡村工业成功的典型“中国吉他第一村”。“上路”是党的基层干部为繁荣地方经济建设的一种“出发”的姿态,无论自己的人生充斥着怎样的酸甜苦辣,都永远保持一种随时出发,迎接任何困难与挑战的姿态,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曹永虽然写了不少乡村的沉重和喘息,但与自己前辈作家相比,也有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诉求。在曹永深沉的诉说后面,不仅有苦痛压抑的悲怆,更有变革现实的奔突烈火。他所期盼的,是那些被环境、被知识、被财富遗忘的边远村庄,以及被欲望、被权力扭曲的荒漠人性,终将成为历史。

可以说,从蹇先艾开始,贵州作家在如何超越地域局限,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方面,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经验与成功实践。今天,十九大精神的学习贯彻,又为贵州作家的创作指引了新的方向,新时代文学的超越需要时代精神的引领,这是贵州作家的共识。中国作协正在加强对贵州作家和贵州文学评论工作者的关注,在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新时代的贵州文学,一定会出现新的面貌。

程耀东《在大地上过完一生》

悲悯情怀下的根脉记忆与个体书写

□刘行青

一些文人,或许会因为深夜楼下醉汉的一声怪叫,便在惊魂不定的心跳中,呻吟出一首荒诞诗;或者臆想一段风花雪月的故事来填充空虚的灵感。但这种虚无在作家程耀东的笔下不会这样“奢侈”。他总是在生存与生活的夹缝中,记录着自己的生命历程。首先得“治生”,写作对于他,不是闲来无事的涂沫,而是“治生”的一部分。但是,又不全是,还是生活的宽慰剂、疲惫灵魂的安居地,是超越琐碎现实的情怀抒写。他的散文集《在大地上过完一生》里有村庄、有人物,还有他自己,我们不妨一起看看。

生活在西海固的人,对“村庄”有着莫名的亲切与无法忘却的记忆,那里是他们生命的起点,也是他们一生取之不竭的精神向度。因此,村庄是西海固人的根脉记忆,也是进入这片土地的钥匙。程耀东和许多西海固人一样,童年、少年时期在一个小村庄里度过,“村庄”刻在他们的记忆深处,如同沈从文的湘西,无论走多远,在哪里,“村庄”如乡愁,永远都在那里等着。其实,随着宁夏移民工程的实施,农民进城务工、送孩子进城上学,西海固许多村庄迅速衰落,有的人去村空、几近于荒芜,有的已经被推为平地,不复存在。但是,人们记忆中的“村庄”依然枝繁叶茂地生长着,文字成为他们村庄记忆的沃土。贫瘠而丰厚的村庄,在程耀东等一批作家的笔下得到再生,并且走出了西海固,获得新生。

程耀东的多篇散文以“村庄”为主题,如《儿时的村庄》《你不能忘却的村庄》《触摸秋天的温度》《村庄里的门》《爱着我的西坡洼》《一个人的下午》《记忆或者碎片》等。《西海固笔录》列在文集的首位,想来是作者最看重的一篇,

也是其村庄记忆的诗意回放。从暮春夏初开始,“农夫们赤了脚扶犁铧扬着鞭子吆喝在沟沿边的一块平整的土地里,搁在地头上的一双黑绒鞋上面落了一层细细的黄土,刚出窝不久的一只黄鼠抱起两只小前爪蹲在上面,一对麻雀唧唧喳喳斜着身子飞起又落下,叫声惊动了正在呆望的黄鼠,于是小家伙跳下鞋面,鞋面上只印下一些细碎的蹄花。”这个片段,让熟悉西海固农村生活的人为之心动,那是生动而真实的画面,谁舍得穿上黑绒布鞋犁地呢?这样的场景,在上世纪80年代也许并不稀奇,然而,在今天,这样动人的村落闲趣,怕是再也难寻了。这些关于村庄的文字还包含着丰富的风物民俗,娶亲的喷呐、老人抽的旱烟、喝的罐罐茶,农闲时唱秦腔大戏,西海固山塬上最为原始的交通工具毛驴车,还有那些神秘的堡子,农民哼唱的小曲或花儿,以及磨刀石、榆木门槛等,都将与村庄一起渐行渐远,最终,多数将陈列于博物馆,需要讲解,年轻人才能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从这个意义上看,程耀东的“村庄”散文正是活态村落保护,值得阅读,也必将引起更多读者和学人的关注。

村庄对于奔波于城市的“农村人”而言,不仅仅是回忆,还是一处让他们身心放松、安全自在的地方。程耀东的散文中,最突出的文字符号是“村庄”,他坦率地说:“生活在城市窄窄的巷子里,到处充斥着陌生、阴谋、喧哗、冷漠……于是,想起村庄,那么大的一所医院:清风把脉,鸟语听诊;田野是病床,庄稼是中药;以柴火煎熬,用泉水冲服,还有抽不去的丝丝病痛吗?”城市远比不上村庄开阔、繁华,然而,在作家笔下却是“窄窄的巷道”,足可知其孤独与压抑,“村庄”此时是诊所,承担起疗救心

灵压抑的功能。他的“村庄”能慰藉城里的乡下人,在物态村庄破败、消失的背景下,作家用文字复原的村庄比商业运作的“村落文化”更有人情味、更能唤起人们的共鸣,通过阅读,使美好的“村庄”记忆得以延续、传承,这也正是这部散文集的人文价值。作家关注“村庄”或许还有个体的原因,那个叫西坡洼的村庄埋着他的母亲,留存着关于母亲的气息——草丛、雪地、羊圈里、土坡上,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因此,当他的笔触落在“西坡洼”,多是柔软的语言、温暖的画面和熟稔的故事。其实,许多已经搬进城的老人过世后,都会“回到”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而没有“村庄”生活经历的后辈们,每年春节、清明……都要回“村庄”祭奠先祖,因此,在西海固人的心里,无论自然的村庄如何荒芜,只要那片故土还在,一定是要回去的,这种根脉记忆并非移民或其他外在原因能够轻易改变,这或许就是民俗的力量。作家在他的散文中,为读者营造了一个集体无意识的记忆场所——村庄,这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密码,等待着读者去探索、破译。

个体是相对于他者而言。写作者能敞开心灵,直面大众、直面自己是需要勇气和能力的。正如作者在文集序中说:“我们一生或许不了解自己的内心,与自己的内心做着持久的抗争,一旦我们了解自己的内心,也就了解了这个繁杂的世界。”从程耀东的散文看,他接纳了坎坷的命运:幼年丧母、青年下岗到中年奔波……他如实地记录着自己的生命轨迹。命运似乎从来没有眷顾过他,即使在生活最为困顿的时候,顶多也只是抱怨着前行,凭这一点,他已经具备了优秀写作者最基本的

朱东《长寿赋》

长寿之乡的诗意流连

□汤松波

长,有战神尊麒麟为凭。地处五岭延脉,位踞三省通衢,古有潇贺石道,今有高铁坦途。山奇峰翠,泉水丰沛,紫土青泥,卉木茂盛。春时穆穆贺江,竹涛阵阵,蒲草舒旖,荷菜展旎;夏时穆穆贺江,雾雨修眉,香樟葳蕤,芙蓉妩媚;秋来稻香收岚气,胭脂金桂,橙橙喜柑,瓜果逸香;冬至棠桥映彤霞,灯蕾闹寒,嘉木含黛,松林抱暖。连绵浩岭,奇崖妙壁,峰兀云淡。迢迢之江,碧水激滟,清可掬饮。富硒沃土,瑰石归真,吉祥福树,瑞雨祥雾。风清气洁,负离子强,天赐氧吧,裨益心腑。醇酒美食,酿菜称奇,油茶豆豉,香溢四邻。天贺之州,物宝地酬。遂百龄寿春辈出,胡考比肩,济济一堂。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近于诗而远于文,介于诗和散文之间。就是这

段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华丽文词,于瞬间就让我看到了日月叠璧,山川焕绮,梦里梦外都是盈盈乡情的那一方水土,字字句句都让我感受到了诗性阅读带来的愉悦。读着朱东这似乎信手拈来的《长寿赋》,就像顺着地图,循着作者的步履,看一场关于旅行的电影。这电影,布满了季节四时变换的风景,布满了庸常生活呈现的自然禀赋,含蓄而隽永,真实而美好。而长寿的秘密和作者对长寿之乡的诗意流连,也就很自然地在这副繁就简的过程中被有效地渲染了出来。

结合自己十几年的创作经历和创作体验,我坚信任何一种文本创作,自始至终都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的。因此,写作和生活一样,作者在创作中除了与自己的灵魂真诚对话外,还需深刻地

不了解西北历史的人,大概不会体味到康声心底的那种强烈的乡土情结。作为一个老浙西北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人一事都是他心底割舍不去的牵挂,也是他灵魂深处的精神家园,更是他文学创作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这也是他在新作《沃血家园》中“情致勃发,不可控勒”的重要缘由。正是带着对我乡我土的这种深深眷恋,这部作品以浙西北小城潜城为引子,以潜城大户罗氏家族三代人在民族危难关头的人生抉择与不同的人生遭际为主线,深耕细作,精断详磨,生动展现了在国家、社会、时代、民族、历史大变局中潜城众生或成长或堕落后或逃避或毁灭的人生历程,对几十年前浙西北的那段屈辱、悲壮、慷慨的历史进行了波澜壮阔的叙事,整体上看,这部作品既厚重、悲情、深沉,也堪称一部具有史诗性特质的族群精神画卷。

□朱首献

气雄力沉 笔苦情深

《沃血家园》在文学思维的呈现上就具有鲜明的复杂性的特色,这也使得该作内部充满着强大的美学张力和文学叙事呈现的能力,这种在文学思维复杂性上的成功体现,也是作者在艺术驾驭能力上的稳健特质和高超水平的一种映照。

其一,体现在叙事的复杂性上。作品将乡土叙事、民族叙事、家族叙事、历史叙事、革命叙事、伦理叙事、苦难叙事、情感叙事等交织在一起,从而使作品在叙事纹理的复杂性上达到最大化,成功开拓了作品在叙事容量和体量上的扩张能力。

其二,体现在人物关系架构的复杂性上。作品将罗氏家族父辈兄弟之间,父辈与子辈之间,以及子辈兄弟之间的人物关系复杂化,写出了他们之间不仅有爱,有亲情,有合作,有拯救,更有利用,有挑战,有妥协,有无奈,有背叛,有乱伦,有仇恨,有厮杀。同时,罗氏父辈的三兄弟与子辈的三兄弟之间又形成一种互相映衬甚至彼此背离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镜子,后者又成为前者的仿象。这种相互缠绕,多重错综,交织、扭结在一起的复杂化人物关系架构,既使故事的走向跌宕多姿,也通过这样一种关系成功描绘了革命激情、政治抱负、民族大义、国家存亡这些近代历史主题对传统人伦、家族血缘关系的撕裂和旧家族向心力的崩离析,进而歌颂了浙西北人民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情怀。同时,作品中这种人物关系架构上的复杂性在显示作者构思机巧性的同时,也使故事内在情节的立体度得到很好的呈现。

其三,体现在情节布局的复杂性上。作品中不仅关涉到重要人物的情节在时空呈现上复杂立体,即使在一些非常次要人物的情节上,作者也绝不会轻易地放过。例如对汪巧云这个人物,作品第十六章写她家被家庭挟持逼婚嫁给本地一个商人,这就为后来第三十三章罗安国上海锄奸返回潜城路上遭遇日寇被汪巧云救下埋下伏笔;再如周妈妈这个人,作品第十九章写安本知道父亲纳了鹊梅曾在暑假逃避至牧南村周妈妈家,这个情节看似闲笔,实则不然,因为它为后来周妈妈和儿子在风岚岗阻击日军先头侵略潜城部队并牺牲埋下伏笔。此外,罗世俊、鹊梅、罗安文之间的三角关系也是如此,鹊梅与安文之间朦胧的爱恋关系似乎随着罗世俊娶了鹊梅做填房就应该终结,但作品却不断通过鹊梅给安本做蚕屎枕头、做布鞋、丝绵背心,安本在病重昏迷时对鹊梅的无意识举动以及他把鹊梅绣着红梅花的白手巾捏在手心等情节将他们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铺垫向高潮,使读者真心希望他们之间会发生些什么,而在作品的情节走向中,他们之间也确实发生了些什么。而且,作品中少年安本的几次梦境的描写,实际上对此后情节的推展和人物命运的走向,也都有着预示的作用。这种伏脉千里、似断还联、筋脉脉通、通体连贯在作品中还有不少,按照中国传统小说技法来说,叫做草蛇灰线,这种伏笔既使前后章节有照应,同时,也使情节在进路上延宕、舒展。中国古人曾讲,“叙事之难,不在聚处,而在散处。”这就是说,讲故事,集中起来讲容易,分散开来讲就难很多,它对作者的艺术才具和审美掌控力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情节布局的线拉得越长,叙事就会越散,作家面对的局面就会越复杂,也就越对作者的艺术全局把握力和艺术思维的整合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沃血家园》中,作者却做到了聚处集中,散处不断,充分体现出作者在掌控情节复杂局面上的独特才具。

此外,作品在艺术技巧和语言的美感上还有不少值得称赞的地方,例如,第三十六章关于《萧萧落木》一出戏,故事内就镶嵌一个几乎同样的故事,这就有一点像叙事学所讲的“纹心结构”的味道。同时,作品在整体架构上切分为五十一章,每章独立成折,这种处理,既是对叙述流和故事流的阻断,制造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上的间离效果,同时又折折相连,一线串联,散而不漫,从而使情节的褶皱性、延宕性和曲折性顿显,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而且作品的文字不疾不徐、从容平淡,自然流淌,不事粉墨,素净简练,但却景阔情深。此外,作品中很多对浙西北自然景观的描绘如云烟开壑壁,充满着诗的意境,体现了作者用语精准、纯熟的语言驾驭能力,既大大提升了作品的文学效果,也足见作者对乡本土土的谙熟与爱恋。在人物塑造上,作品追求人物形象的整体丰满,作品中主要人物不自待言,尤其是对其中着墨并不多的几位人物,作者事实上也是尽有限的笔墨塑造出了他们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例如,有士大夫之气的魏知事,忠于罗家的仆人赵达,泼辣耿直的村妇阿媚,薄命女子小红宝、背信弃义的兵痞朱信义、汉奸刘宝元等等,这一系列成功的人物形象形成了众星拱月之势,从不同侧面成功地彰显了作品的主旨。同时,作品注重在复杂的人性逻辑中确立人物性格的真实性,提高了读者对作品的信任度,也拉近了读者与作品中人物的距离。

在我的印象中,朱东一直是一位善使“重兵器”的作家,短短几年里就为广西文坛贡献了《股份农民》(广西人民出版社)《沧海之约》(红旗出版社)两部部长篇小说,且《股份农民》获得广西区人民政府文艺创作最高奖“铜鼓奖”,一版再版,在八桂大地颇有“洛阳纸贵”之势,业绩骄人。直到最近第十届广西(贺州)园林园艺博览会在“世界长寿市”——贺州市开幕,笔者欣然前往“园博园”踏秋探胜时,在长寿阁上读到了他的新作《长寿赋》才发现,他竟也会把这种短制的“轻武器”玩得有滋有味,游刃有余。陪同我共赏长寿阁的瑶族小说家冯告告诉我,作家贾平凹先生主编的《美文》也不吝版面推出了该篇美文。至此,我似乎明白了,不显山不露水的朱东,就是我身边怀揣“绝技”具有“轻重功夫”之人。

贺州,地处岭南,境内水源丰沛,森林繁茂,民族杂居,乃中原文化、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交汇处。2016年10月,通过国际人口老龄化长寿化指导委员会和国际地理联合会健康与环境委员会的评审,贺州市获得了“世界长寿市”的权威认证。朱东即在此背景下,挥笔直指贺州的悠长岁月和美丽山水——“贺州,旧谓临贺,史载绵

要也。人若能回归初心,颐淳朴之态,存乐观之念,养浩然之气,凝进取之神,则可享龟鹤遐寿矣!寿之有长短,人不可预,长者固可慰,短者不须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当惜时争光,笃信奋勉,寿而有所为,不移白首之心,不坠青云之志,以有限之时,谋经远之业,以思想之光,照人生之旅。此不亦上善乎?”读到这里,我不能不说,作者作为这个时代亲历现场者,他的词赋是反映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关于美的纯粹的思考,是关于人行走世间如何面对苦难与坎坷,如何自我滋养、调节的心灵叩问与完美的诗意回答。这样质朴的写作路径,于平常的语言中溅出跃动的生机。这样有情有爱,充满思辨的文本表达,舍弃夸饰,令人倾心。

窃以为,创作文本升华的过程,也是作者生命自我升华的过程。齐奥朗说,写作中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就是浓缩的时刻,当我读到《长寿赋》结尾处“独寿不如众寿”这句时,内心的喜悦与兴奋浓缩在长久的感叹中。此时,我觉得我和作者的心走到了一起,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共鸣吧。当然,除了共鸣,这还是我们一生要追求和渴望的土地一样的本质,天空一样辽阔的情怀。

